

中英文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》：

让世界看见中国摄影的魅力

张鹏禹 叶子

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，摄影如同一枚棱镜，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复杂光谱。它是历史的见证者，将民族记忆凝固在胶片与像素之间；它是变革的推动者，让无数社会议题进入公共视野。在当代，摄影更成为全民参与的日常活动。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的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》，历时6年精心打造，以500余幅摄影原作与约40万字的文本，系统梳理中国摄影从民国至今的百余年历程。它不仅是影像的集合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，为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兼具文献价值与美学深度的读本。围绕该书编写，我们对主编荣进行了专访。



问：在中国摄影史编纂方面，近20年来有泰瑞·贝内特的三卷本《中国摄影史：1842—1860》《中国摄影史：西方摄影师1861—1879》《中国摄影史：中国摄影师1844—1879》及《中国摄影艺术史》《摄影中国——中国摄影50年》等书，产生较大影响。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》在同题材图书中，有什么独特性？

答：前贤之作，功在开拓。泰瑞·贝内特的著作，展现了早期西方摄影师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摄影活动，梳理了中国摄影史的开端，如照相馆的设立等，并且列举了大量早期的记录性影像。其著作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。本书力图构建一种由内而外、经纬交织的全新叙事。其独特性首先在于结构的精心设计。我们邀请了巫鸿、顾铮、陈申、徐希景、高初等深谙中国视觉文化与摄影史的权威学者，分专题进行纵深论述，确保了学术基础的坚实。其次，本书确立了“原作”与“研究”并重的原则。500余幅精选的摄影原作，并非仅仅是插图，而是与严谨的学术文章互为映照、彼此阐发的核心史料。我们通过对作品物质性、图像语言的细致呈现，让读者直接感受摄影艺术本体的创造力与演变。这使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通史，成为一部既可研读、又可鉴赏的立

体化摄影史文献。

问：20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经历了哪些重要时期？这本书如何体现这种阶段划分？

答：从时间维度看，本书以民国时期、新中国成立初期、改革开放后三个时间段为划分，全景式呈现不同时期中国摄影家在摄影艺术上的探索和成就。书中汇聚了摄影界众多有影响力的学者、策展人、艺术家和收藏家撰写的专题文章。他们或从中国摄影发展脉络入手梳理，或从摄影艺术家和摄影文献个案分析切入，生动展现一个时代的摄影风貌。本书以摄影原作构建横向框架，以学术研究形成纵向支撑，兼具丰富的作品展示与深入的研究内容。

书中的专题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，对中国摄影史上的关键个案与现象进行剖析。如通过对《良友》画报的研究，分析民国时期的摄影生态及其对庄学本摄影创作的影响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问：本书有几篇文章专门对骆伯年、庄学本等摄影艺术家进行个案分析，这种个案分析如何呈现一个时代的摄影面貌、社会语境？

答：个案研究是进入历史深处的一把钥匙。对骆伯年、庄学本等艺术家的深入分析，其意义在于将宏大的历史叙述，锚定于具体的生命经验与视觉创造之中，让我们得以窥见时代精神在个体身上的折射与灌注。

例如，骆伯年的创作轨迹，便是一部微缩的民国摄影美学交融史。他早期画意风格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题跋趣味，体现了探索“中国化”摄影时的文化依附。

其后他对德国现代主义风格的借鉴，以冷静的视角拍摄齿轮、杯盏、折扇与餐具，则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艺术家主动吸纳西方现代摄影语言的前卫姿态。一张静物，背后是中西美学思潮的碰撞。

金石声的作品则更早地摆脱了画意风格，逐渐显露出现代主义摄影的样貌。他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《踩水车的吴淞农民》等作品，摒弃了柔焦手法，以平直的视角抓取乡村风景，注重调节节奏的控制，从形式上遵循和发扬了现代主义早期的形式主义语言逻辑。此外，他还尝试了红外线摄影，用新技术呈现充满画意的江南景致，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摄影的艺术表现力。

再看庄学本，他的西部影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志记录，其镜头中蕴含的平等、尊重，在战乱年代构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理解与人文观照，反映了知识界“到边疆去”、认识祖国的时代思潮。

因此，个案如同一枚棱镜，能析出摄影艺术在技术条件、美学风尚、文化认同与社会使命等多个层面的光谱。

问：这本书的出版，可以说集合了学者、策展人、艺术家、收藏家、出版社各方的力量，你们希望这本书在摄影史研究、公众鉴赏等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
答：我们期待本书能扮演三重角色：其一，是学术的“奠基之石”。它以如此规模的原作图像与权威论述相结合的方式，系统梳理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摄影史，希望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与讨论框架。

其二，是公众的“启蒙之窗”。对于广大读者而言，本书是一部可视、可读、可感的“纸上摄影博物馆”。它能让人们超越或新闻摄影或艺术摄影的单一视角，看到摄影作为社会镜像、情感载体与文化武器的多元面貌，提升视觉素养与历史感知。

其三，是行业的“聚力之旗”。本书的出版证明，通过学者、机构、出版社的深度合作，我们可以有效地抢救、整合并传播散落的摄影文化遗产。我们希望能鼓舞更多力量投入摄影的保存、研究与公共教育之中，共促建立一个健全的摄影生态。

问：我们了解到，这本书包含中英文两个分册，为什么要策划并出版英文分册？团队接下来还有什么面向海外的出版或推广计划？

答：出版英文分册，源于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：中国摄影是世界摄影史不可或缺的篇章，它的智慧与魅力应当被世界看见。长期以来，国际学界对中国摄影的了解多限于零散的个案。本书英文版，正是要将这些璀璨的珍珠串成一条线，呈现给海外读者。它不仅是图像的输出，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觉叙述，是中国美学与西方媒介对话的独特案例。

此举已初见回响，本书中英文版已被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等收藏，标志着其得到国际知识界关注。出版社告诉我，接下来，他们将继续积极推动本书的多语种版权输出。我们期待以摄影为桥梁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，让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视觉创造，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图景贡献其特有的篇章。

2025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，公祭日前不久，《正义的回响：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》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。该书还原了二战后同盟国在亚太地区对日军战争罪行的审判概况，系统梳理了二战后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实况，完整记录了国际社会以法律手段清算战争罪责、重塑国际秩序的历史。本书的叙述，既构建于战争亲历者及其后代的珍贵记忆之上，也得益于对数十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深度访谈。同时，书中更融入了从世界各地发掘的影音资料与文档，重现了诸多被尘封的关键细节，共同向世界昭示和平的永恒价值。

《正义的回响：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》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，从四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所档案收藏机构，挖掘和收集大量一手珍贵资料，以翔实的史料还原一次次公平、正义、文明的审判。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、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、英国国家档案馆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、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、菲律宾国家档案馆、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，资料涉及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荷兰语、日语、马来语等语种。从历史人物到今人，战胜国到战败国，审判者到被告人，国际到国内专家，该书通过各国人民对二战及战后审判历史的集体回忆，结合大量日记和约300张图片，用立体视野，冷静、客观、理性的叙述方式，讲述二战时期同盟国携手赢得反法西斯战争，以及在战后设立军事法庭，惩处战争罪犯的历史。该书遍访战争或审判亲历者，不仅是记录历史，更是一一场关于法律、道德与人生的深刻思辨。这是一部充满力量、引人深思的警示录。

历史记忆往往影响着几代人，因此，捍卫二战各同盟国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结果，以史为鉴维护历史公平正义，对建设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的世界，具有重要意义。书中回顾了《联合国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《日本投降书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，提醒人们珍视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。以同盟国在世界各地地区的审判为代表的二战后国际对日战犯审判，把日军的战争罪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让历史定论不得被轻易翻案。这一系列审判成果是二战后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，至今影响着国际关系框架，因此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《正义的回响：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》还收录美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等

《正义的回响：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》：深度还原正义审判

陈亦楠



国家近30位政要与相关领域专家的观点，构建战后审判国际叙事，广泛凝聚国际共识。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、被誉为西方研究东京审判第一人的大卫·科恩、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教授顾若鹏等。这些政要与国际专家提供的见解，有助于全面还原历史真实，助力读者深层认知战后审判史。

《正义的回响：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》无疑有助于以史为鉴，凝聚尊重国际法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的广泛共识。

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研究员）

搭建作家与读者的桥梁

季栋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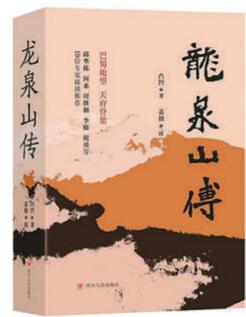


“要反映现实的东西，必须写到位，所以我分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抒发精神世界，越虚越好，写得浪漫唯美；一部分是写现实生活，越实越好，都是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一句胡编，写得很实在，另一方面尽量张扬内心世界。现实中的带灯，完全是凭借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爱情的向往应对现实中的无奈和痛苦。”

写作几十年，舒瑜瑜也采访过我几次，彼此之间更为了解信任。采访中，她提到我的作品“既不是家庭伦理小说，也不是社会心理小说，为什么如此着迷于大量的日常生活琐事？”这一概括正是我作品的特点，也更容易引发我的感触，所以我回答：日常生活琐事有生命的气息，有时代的气息，而生活的丰富性、情趣性、真实性都是通过日常的琐碎体现出来。

舒瑜瑜的“访谈”不止于一问一答，而是建立在她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与对时代的深度思考之上。在问题提出后，层层追问，循循善诱，她总能让作家自然坦露创作的心路历程或经验之谈，从容完成与作家的深度交流，从而满足读者探寻好作品诞生幕后故事的需求。比如在《何建明：我还是一名“冲锋的战士”》访谈中，舒瑜瑜提出：“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？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，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。”何建明认同这一观点，回答说：“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故事，是当代作家首先应该解决的第一课题。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。”

舒瑜瑜曾言：“访谈是一次次寻找，用你敏锐和善于捕捉的眼睛去发现、寻找作家埋藏在故事中的技巧和诸多的喻义，一旦进入他们文字的迷宫，有多少耐心的发现，就会收获多少乐趣。”她的访谈、对话是作家的心灵简史，也是时代的文学简史，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鲜活注脚和宝贵史料。



分栋山前曙色新 ——读凹凸非虚构作品《龙泉山传》

阿来

的风云漫卷、历朝历代移民迁入所带来的文化融汇、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迁、当地社群对山水的依止与改造、风土与教习所产生的杰出人物，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《龙泉山传》更是深入历史细部，搜罗之广，眼界之宽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与记录作了清晰的梳理与呈现。读其书而感念有惠于我的编者人，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钦佩。某天在网上搜罗旧书，得一套明代蜀王的文集《明蜀王文集五种》，包括《献园睿制集》等。拜读时才知道，这套书大多是据原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公文書館的孤本。也赖龙泉山当地学者苦心搜求得来，重刊于世，不仅有助于龙泉山境内明蜀王陵群的研究，更足见龙泉山当地学者的视野也不独关注龙泉山。阅读这套书所关涉的内容，彼时成都乃至四川一省的社会状况、政治生态也顿时在眼前鲜活起来。

知而不足，又问自然地理呢？比人类历史更为漫长，进而决定了族群生存生产生活状况的自然山水呢？《成都市龙泉山志》中有自然地理的专章，山形水势，气象地质，矿藏与生物资源，莫不巨细述及，但山长水远，一地之志，难免囿于行政区划的范围。关于龙泉山山形水势，一时之愧暂解，而未能全慰饥渴，有心想要亲身踏勘，又苦于缺少必要的时间。

正苦恼时，那天与雍也、曾涌和刘晓双等一众龙泉山友在国庆节前小聚，其间自然少不了凹凸。茶酒间，他透露，新脱稿一部

《龙泉山传》，是他近年来广泛踏勘，山北山南，山东山西，遇峰攀高，逢水循源，过村问史，上路量长，再谋篇布局，已然将整条龙泉山脉地理人文置于书中，成一幅龙泉山脉全图了。俗话说，打瞌睡遇到了枕头，这巧合也是我与龙泉山、龙泉山有缘的一个证明吧。当即向他索要尚未出版的电子文档。

好些天，都在抽空读文稿，枕上、车上、机舱里，都举着手机，得以由文字进入了一个深广世界，乐而忘返。《龙泉山传》这本书的确是期我期待的，从地上望，知晓了龙泉山的北起与南止，最引人入胜的，是对这道古代叫作分栋岭山脉的中段的书写。四川盆地的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，既由此山区隔，也由此山将水系与道路枢纽勾连。此地民众由山前沃土清流滋养，文脉由山上明月松风滋养。在凹凸山绕水环的笔下，所有追溯、感念与思量，自然人文的宏观概括，或历史、现实场景的微观呈现，都靠他一一路勘，一一寻访，再用富于激情的文字，让时间与空间交织，得以实现。

当年，杜甫客居成都时，在节度使严武官厅上观岷山沱江图，留下诗句说：“沱水流中座，岷山到此堂。”显然，那不是出于文人对气的一般山水画的观赏，而是对川西地理形势的总览，有一种全盘了解一地大勢的愿望。凹凸这本体量达数十万字的新作，也正好承接了这样一种深具国家情怀的传统。

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·布罗代尔在《论历史》一书中，将历史区

分为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。地理时间是自然演化，社会时间是人类文明历程，个人时间在凹凸这本书里，可以视为他在书写过程中对前两种时间的有机熔铸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创新与尝试。今天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拓展，就是以科学的眼光与方法，重新看待自然山水，以超越古人审视大自然时那种托物寄意的审美方式，吸收世界文学中博物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方法，重新打量与书写人和人群所在身的环境。这也是凹凸近年来的写作转向地方志，用科学方法关注与阐释自然对象的一个重要收获。此前，他的这种努力在获杨升庵文学奖的诗集《水房子》中，已露端倪。这一回，以非虚构的大散文正面突破，所得收获，可喜可贺。

唐人写龙泉山留有“分栋山前曙色开”的鲜活诗句。那是纯粹的自然风光描写。而今天，用自然的、人文与科学三重眼光打量与书写这片山河，当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。将唐人诗改一字，“分栋山前曙色新”，多少可以说出一点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了。

龙泉山，过去是成都的东部边界，如今，因势而变，已是迅猛发展的大成都中心的森林公园。成都，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，正要靠这龙泉山上的绿树与长风清新地呼吸吐纳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期待有更多此类新作问世，如古驿道绵长恒久，像林涛声日益浩荡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）